

一次照相引发一位重臣下台

在晚清的最后几年里，西太后同意了新政，并组建了以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绍英以及端方五位大臣为首的考察宪政团。端方，也迎来了他人身中最重要的时刻。

以端方、戴鸿慈为首的第一波考察团，在上海吴淞口登上了美国的西伯利亚游轮，迎接他们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明。

半年的考差结束后，五大臣以梁启超和杨度在东京写的宪政文章为基础，向朝廷上了《考察宪政报告》。最终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签订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事宜谕》。然而此时，慈禧太后死亡的日子仅仅只剩三个月。

端方喜欢照相，在考察外国的过程中带回了一台相机，1908年11月9日，执掌中国47年的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逝去后的第二天也死了。次年11月19日，慈禧出殡的那一天，端方沿路安

排摄影师拍照，当梓宫行至东陵隆恩殿之时，几名摄影师突然被官兵拿下随即肃亲王亲自审讯，摄影师很快供出了端方。

摄政王载沣原打算将这件大事化小，然而隆裕太后身边的大监小德张，勾结了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节，李国节上书称“当梓宫奉安之时，为臣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为不恭，实系全无心肝。”

小德张与端方是有过节的。瑞方在一次于小德张的见面中，端方只是略微动了动胳膊作为还礼，小德张认定了他傲慢无礼，于是借着这次机会，怂恿隆裕太后将端方革职。11月23日，清廷军机处阁议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将端方撤职处分。

早在这之前关于端方要被革职的消息传的满城风雨，但端方仍不相信，他竟然因为一部照相机，而被他的同僚们拉下了政治的舞台。

1909年，革命党人在中国各地掀起革命，清政府不得不四处镇压。然而此时的国库，早已是一贫如洗，为了镇压革命，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决定，将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以铁路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借款。

川汉、粤汉两条铁路，一开始便是以“民股”的办法筹得款项，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铁路收归国有，极大地损害了四省人民的利益，于是出现了保路运动。

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会的成员，消息传开，数万民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了成都血案。

赵尔丰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四川群众，保路军人数一度达到二十余万。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赶紧召出赋闲在北京的端方，让他赶到湖北，带领新军去



四川镇压。而此时的端方，依然是不支持铁路国有，一路缓慢行程，直到7月4日才到达汉口，随后前往四川。端方带走了大部分新军，使得武昌城内守备空虚，武昌的革命党人，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便有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革命浪潮高涨，端方在四川资州被随行的新军砍下了头，装在早已准备好的盒子里，送回武昌作为革命的投名状。

端方的死，成为了清朝灭亡的开始，他的政治理想，也随之化为泡沫。

搜狐历史 2017.3.8 文/君静

晚清官员日常生活 书法修炼必不可少

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大概分为三种：练习，自娱，应酬。他们一般都会练一些字。

那么，晚清官员要花多长时间写字？举例来说，曾国藩每天都给自己定一个课程的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存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学习老师每天练字。每天临一篇，大概一百来字。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中国派到欧洲的大使，他也写字，而且非常系统。他有时按照篆隶正草的次序临帖，亦即一天篆隶，下一天临楷，然后正，最后草，如此循环往复。

日常的书法活动还包括朋友之间的切磋书法和独自领悟书法，曾国藩的友人何绍基，是晚清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曾国藩与其见面时经常切磋书法。据其日记记载，如：“酒后，与子贞谈字”，“至何子贞处，观渠作字，不能尽会悟，知平日所得者浅也”。

为什么晚清官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练字？张佩纶在致友人的书札中，曾提到李鸿章为人写对联的事：“合肥每年必写楹联一二月，藉以消夏。戊子（1888）后因病中辍，家人以解衣磅礴，出汗过度劝止，去年九月，因为兄旧居名致书屋榜，乃先君斋名，必欲亲书，恐手生荆棘，活腕十余日始书之。”练了十几天的字才下笔，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懂书法，你还真不能随便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在清代有很大的增长。人口增加了，但有些官职并没有增加。那是人口多了，读书人也多了，那能不能分担写书法的人的负担？其实不然。中国书法的流动有三种模式，一个是同辈之间流动，一个是由上向下流动，一个是由下向上流动。而真正的流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官越大，名气越大，写字越多，所以增长量越大，他们就越忙。

《广州日报》



结绳记事

在远古时候，文字还没有产生。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实物来唤起记忆，这就流行了“结绳记事”、“刻木记事”和“堆石记事”等各种方法。

“结绳记事”，就是在绳子上打结，用结子的大小、多少和位置来表示不同的意义。除了结绳，刻木记事也非常流行，就是在木头上刻上许多不同的符号

书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

来表示不同的事物。这种结绳和刻木是帮助回忆记事的符号，是书的前身，但还不算文字。如果说“文字”，就是以后发展起来的“图画文字”。

我们的祖先把从事生产劳动，与周围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他们所居住的洞穴壁上。后来，就慢慢地只用几根线条来组成一个大概形似的轮廓，把原来复杂细致精确的图画，简化为一定形式的图案符号，使人们看到这个符号，就能知道代表什么事物。这么一来，这些简化的原始文字符号就和语言有了意象关系。以后就逐渐地用它来代替语言表达思想，进而交流经验、传播知识。这样，便出现了原始的图画文字。

这种图画文字，起初是很不统一的。有繁有简，后来进行了整理、统一、简

化，也使书写方便了。

后来，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出现了有关占卜吉凶的书。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记录材料，把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最早的图书——甲骨的书。

我国最早的书还有“简策”、“版牍”、“帛书”。用竹做的称“简策”。把竹筒破成一条条又窄又平的细分签，就可用笔在上面写字，当纸使用。一条竹签叫“简”，许多条竹签连结在一起叫“策”。“简策”最早出现在南朝中叶。

用木头做的书称“版牍”。把树锯成若干段，再将段锯成薄片就叫“版”，在“版”上写字后，就叫牍。把薄片编起来，就是“版牍”。“帛书”是写在丝织品帛上的书。

历史之家 2017.3.24

条形码的前世今生

条形码技术最早产生在二十世纪20年代，诞生于威斯汀豪斯的实验室里。一位名叫约翰·科芒德的发明家想对邮政单据实现自动分检。为此，他发明了最早的条码标识，设计方案非常的简单，即一个“条”表示数字“1”，二个“条”表示数字“2”，以此类推。然后，他又发明了由基本的元件组成的条码识读设备：一个扫描器和一个译码器。扫描器能够发射光并接收反射光，而译码器具有测定反射信号条和空的方法，以及使用测定结果的方法。

此后不久，科芒德的合作者道格拉斯·杨，在科芒德码发明的条形码技术

基础上作了些改进。杨码使用更少的条，但是利用条之间空的尺寸变化，就像今天的统一商品条码（UPC码）符号使用四个不同的条空尺寸。新的条码符号可在同样大小的空间对一百个不同的地区进行编码。

1949年，专利文献中第一次有了诺姆·伍德兰和伯纳德·西尔沃发明的全方位条形码符号的记载。伍德兰和西尔沃的想法是利用科芒德和杨的垂直的条和空，在一片黑色的背景之上，有四根白色的棒子，其中第一根是定位用的，必需永远存在。后面三根和第一根的距离固定，而它们的存在与否就等同于二进制的“0”和

“1”。在这个简单的模型里，一共可以有七种不同的组合，但只要能增加白棒子的数目，就能容纳更多的组合。

1970年，美国超级市场委员会制定出通用商品代码UPC码。UPC码首先在杂货零售业中试用，这为以后条形码的统一和广泛采用奠定了基础。次年，布莱西公司研制出布莱西码及相应的自动识别系统，用以库存验算。这是条形码技术第一次在仓库管理系统中的实际应用。

1972年，蒙那奇·马金等人研制出库德巴码，到此美国的条形码技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3年，美国统一编码协会建立了UPC条形码系统，实现了该码制标准化。现如今，条形码和自动识别系统和数据采集技术依然在全球范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蝌蚪五线谱 2017.3.24

改变历史的“脚疾”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打破了清政府的春秋大梦，朝廷派荫昌前往湖北镇压，但军队却是袁世凯的北洋军，此时朝廷一致要求启用被罢官在家的袁世凯。武昌起义的第四天，朝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协同荫昌和萨镇冰的水路军队。袁世凯却回复，无奈当前脚疾严重不能走路，等病好了，一定为朝廷效犬马之劳。

明摆着是嫌官小。荫昌指挥不动军队，而形势不等人。朝廷再次下诏，召回荫昌，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参战部队、增援部队和长江水师均归其节

制。不过，在清王朝历史上，最先拿脚疾说事的并不是袁世凯，他最多排第二，第一个应该是盛宣怀。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幕僚，1872年李鸿章开启近代航运事业，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公司，1873年李鸿章责成下属丁寿昌改组轮船招商公局，丁寿昌召唐廷枢、朱其昌、盛宣怀到天津开会，但是盛宣怀没有来。

盛宣怀之所以不来天津，因为他在给丁寿昌的信中写到原因：脚疾犯了，并且继而说到如果按照他的办法办，他会去天津汇报；如果不能按他说的办，总

办的职位就不要考虑他了。

总督大人并没有为难盛宣怀，仍然委以会办，负责漕运和揽载。盛宣怀造铁路、管航运、执掌电报、接管纺织、开采矿业、开办银行，还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竟成为洋务运动持牛耳者，影响了中国近代工商科技金融教育诸事业的发展轨迹。

在袁世凯“脚疾”之后，第三个犯脚疾的是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候。后来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山穷水尽，请段祺瑞复任陆军总长收拾残局，段祺瑞以此为由推托，表面上是嫌官小，实际上是逼袁世凯改回原有体制。袁世凯无奈只好答应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任命段祺瑞为总理。这就是段祺瑞著名的“三造共和”之二。

央视网